述概史教佛代隋

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提要 • 富吉藍 •

一、中國佛教的轉捩點

北周任道林曾說：「道不自道，非俗不顯。佛不自佛，惟王能興。是以釋教東傳，時經五百，弘通法化，要依王力。方知道藉人弘，神由物感，佛之盛毀，功歸聖旨。」①

唐法琳「破邪論」卷上：「自五百餘年已來，寺塔遍於九州，僧尼溢於三輔，並由時君敬信，朝野歸心。像教興行，於今不絕者，實荷人王之力也。」

任道林與法琳的話，可視之爲北周與楊隋二代佛教興衰原因的扼要說明。有隋一代佛教的復盛，楊堅、楊廣父子的提倡實爲主因。而由於隋代佛教的復興，因而奠定了唐朝佛教盛世之基石。如果文、煬二帝是個不信佛、不提倡佛法的國主，則我

國佛教之能否肇開唐代盛況，實在不敢斷定。因此，隋代可視爲中國佛教的轉捩點，而二帝（尤其是文帝）則爲這三十餘年佛教復興的主要推動者。

有隋一代，天下一統。舊有南北分裂的佛教，也隨著政治的統一而告合流。而其原動力也不能不推楊氏父子。文帝時，西京是天下名僧的集中地。煬帝卽位，東都又成爲南北名僧的滙合之所。四方沙門的陸續聚集，乃打破了舊有佛教南北互異的地方性。而各地名僧的入聚兩京，也都是二帝所主動延攬的。因此，隋代佛教之統一，文、煬兩帝的推動，也是主要原因。

二、隋代佛教發展的積極助力

隋代佛教復興極其迅速的原因，除了君主的熱心提倡之外，上層社會的普遍奉佛，也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。楊隋皇室的佛教信仰，可以說是世代相承的。貴族的提倡與護法，對於佛教發展的助力之大，自是可想而知。由君主而影響及於諸王與官吏，遂使佛教成爲隋代上層社會最普遍的宗教信仰。上層社會的崇佛與護法，是佛教發展的積極助力。而在消極方面，有一個重要的條件，也促使隋代佛教的發展格外迅速，此卽排佛言論與排佛事件的稀少。除了盧思道對佛教妨礙國家經濟一事曾加評論之外，政府官員中，我們未曾發現其他貶斥佛教的言論。至於排佛事件，除了喪心病狂的酷吏王文同曾屠殺佛徒之外，隋代史料也沒有任何關於官員排佛的記載。這也是隋朝三十七年中，佛教能蓬勃發展的重要原因。

從南北朝以降，士大夫之關心宗教及世俗教化者，每持三教調融論。而隋代學者也頗有這種風習。顏之推、李士謙、王通等人關於儒釋二教的議論，就有明顯的調融傾向。這些人中，有認爲儒釋二教本爲一體的，有以儒家學說擬隋佛教義理的，有主張三教可以合一的。各人的主張容有小異，而其會通調融的傾向，則大體相同。這種傾向可說是隋代思想界的一項特徵。

三、道家的排佛

由於佛教勢力的蓬勃發展，雖然道教在當時也受到執政者的保護，而因其勢力仍遠不能與佛教

相比擬。而且從很多跡象顯示，當時佛教僧人對道教頗爲蔑視，也常有凌逼道士的事例。處在這種劣勢之下，道教徒之必然會有積怨，自是可以揣知。唐朝初年，曾爲道教徒且極尊重老莊的太史令傅奕，曾在武德年間向唐高祖與太宗提出激烈的排佛建議。

他曾向太宗說：「佛是胡中桀黠，欺誑夷狄，初止西域，漸流中國……模寫莊老玄言，文飾妖幻之教耳。」臨終又誡其子云：「老莊玄一之篇，周孔六經之說，是爲名教。汝宜習之。妖胡亂華，舉時皆惑。唯獨竊嘆衆不我從。悲夫！」②

姑不論傅奕的持論是否另有其他心理背景，然而從其斥佛語句之激烈與對佛教之缺乏同情的瞭解，以及對老莊之學的景仰等心態，也可想見其中當亦存有道教徒發洩宗教積怨的報復心理。這種歷史現象，似乎頗值研究宗教信仰心理者之參考。

四、政府對佛教的管理

隋代僧官多立在文帝之時，中央級主要僧官是昭玄統與昭玄都，由政府聘請名僧出任。另有翻經學士，出任者有僧人，也有世俗居士。此外，有外國僧主一職，專爲安撫外國僧人而設。地方僧官，則州設僧正與沙門都；郡縣佛寺則設監丞。據現存史料顯示，州級以上的僧官，都任命於文帝時，沒有一位是由煬帝所勅任的。

隋代掌理佛教的崇玄署，雖然沿自北朝僧制而來，然而與北魏、北齊都不盡相同。依隋制，崇玄署地位在九寺之下。但並不像魏制之歸隸於宗正卿，而是隸屬於鴻臚寺。

隋代政府對僧籍的處理，雖然有制度，但管理並不嚴格。主要原因是文帝以興復佛法爲己任，所以對於民衆之欲出家爲僧者頗致鼓勵，因而往往准許大量的私度僧尼取得僧籍。

文帝之勅設二十五衆與五衆，是國史上帝王弘法的一段極有意義的事。二十五衆是隋代弘揚大乘佛法的大本營。五衆則猶如隋代傳授佛教義理的國子學。這兩項組織如果能夠持續下去，姑不論其對儒、道二家與世俗政治會發生何等影響，然而就佛教立場來看，其於大乘佛法與佛教義學的發展，必然會有極大的助長作用。

寺額之於寺院，就像僧籍之於出家人一樣。隋代政府對於寺額管理，雖然也有官式的規定，但却與處理僧籍的態度相同，並不嚴格限制。至於寺院的興建，此時期最大的特色是官立寺院特別多，而且捨宅爲寺的風氣也極其盛行。

五、寺院的經濟來源

隋代寺院的經濟來源，除了寺院所常有的一般性布施之外，某些特別受帝王眷顧的寺院，其經濟來源則爲官費與帝王的不定期布施。所布施的內容，除了金錢、日常用物之外，也有土地、莊田、碾磑等產業，以及供寺院驅役的民戶。對這些產業的經營，也是某些寺院的經濟基礎之一。至於民間布施，此時期有三階教的無盡藏院崛起，這是鼓勵信徒布施之極具煽動力的機構。儘管無盡藏院到唐代以後，演變爲兼營金融事業的寺院組織，然而在隋代，這措施確是一個專門鼓勵布施的法門。我們並未發現有該組織兼營金融借貸事業的任何證據。

六、佛教的義學和民間的信仰

在佛教義學方面，隋代以涅槃、攝論二書最稱顯學。其次則爲智度、十地二論。此外，研究三論、四分律、法華、華嚴者也不少。當時的涅槃重鎮，當推慧遠與曇延二僧。攝論名家有曇延、靖嵩、智凝等人。而四論名師，則首推嘉祥吉藏。其餘如智炬、法澄等人也都是斯學名家。律學方面，隋代盛行四分律，而以智首、洪遵二人之成就最高。爲時僧衆最常讀誦的經典是法華經。此外，小乘學者仍不乏其人。隋代的小乘論師以志念最爲傑出。

在民間佛教信仰方面，此時以彌陀與彌勒信仰最爲流行。闡揚彌陀淨土的名家如道綽者，即公然宣稱西方（彌陀）淨土遠較娑婆世界（釋迦化土）之修持爲簡易可行。至於彌勒信仰，則係沿襲南北朝以來的佛教風尚。隋末頗有假藉彌勒信仰而爲亂者。此外，當時民間有一些爲傳統佛教所排斥的特殊信仰，即提謂教、三階教、塔懺法、自撲法等。以提謂、三階二教勢力較大。

南北朝以來南北互異的佛教偏尚，到隋代大體已經打破。在義學宗尚方面、造寺立塔等宗教行爲方面都可以看出統一的現象。隋代由於政局的統一

，也促使南北的佛教偏尚互相交流。例如佛教內的清談風習、原爲南方所流行，而入隋以後則盛行於兩京。原爲北方所偏尚的寺塔營建事業，則瀰漫全國。隋代全國的佛教中心是文帝時的長安與煬帝時的洛陽。這與二帝的提倡，有極密切的關係（關於重要僧人的歷史地位之討論，拙文曾敍述信行、智顗、吉藏、慧遠、彥琮等人。當然，隋代三十餘年間的重要僧人，必不止此數。例如曇延、智首、洪遵、靖嵩、志念等人也都是飲譽一時的義學沙門。然而由於他們的著作大多已失傳，除了「續高僧傳」之本傳外，史料奇缺。而且拙文第四章第一節「隋代佛教義學的偏尚」中，也已分別討論過他們的主要影響，因此本篇未再闢專章介紹。）。

七、信行、智顗和吉藏

綜觀隋代三十七年的名僧，可以發現一項事實，即此一時期的中國佛教係以中國僧人爲主。當時的外國沙門所佔地位已不復如前代的重要，譯經事業也不是當時佛教界的第一要事。西行求法者竟無一人見諸史乘。可見到楊隋一代，我國佛教已經開始具有「獨立自主」的氣象，不再一味依賴外國沙門了。

信行與智顗是中國佛教史上的兩個第一流人物。信行的行持、學說與教團，影響及於唐代社會數百年。智顗的學說，尤爲中國佛教義學的中流砥柱。加上吉藏對三論之學的闡述，慧遠「大乘義章」之綜合南北朝佛教學說等等，都可以看出在佛教之基本內涵（義理與行持）上，隋代的中國佛教確已可與印度佛教分庭抗禮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隋代是我國佛教由依附印度而邁向獨立自主的分水嶺。前此以翻譯爲主，此後則開始有獨創性的教義。

就宗派形態而言，趙宋時期中國佛教徒心目中的宗派，在隋代僅有信行的三階教團勉强夠資格。至於智顗的天台山徒衆，儘管已有具體而微的宗派形態，也具備了一個佛教宗派的堅固基礎，然而却缺乏宗派意識，吉藏及其徒衆更是如此。因此，就宗教意義而言，天台、三論二宗在隋代是並未發展到完成階段，至多只是一個具有系統與規模的學派而已。

如果以信行與智顗二者的型態相比較，我們會

發覺他們的不同風格也各自限定了對當時及後世的影響對象。信行的教義較簡單，因此在當時及後世的信徒多半是民間百姓。智顗的學說較高深，因此其信奉者則以義學沙門或知識份子爲多。如果信行的三階教法在唐代不被禁抑，則其對後世的影響力，可能不遜於以義學名世的天台教法。

吉藏是三論之學的代言人，慧遠是涅槃元匠兼地論學者。這兩位都是相當成功的學僧。他們對後代的影響，雖然只限於佛教義學這一層面。然而，他們在這方面的成就則相當可觀。他們不止在各自所學的領域內爲後代佛徒做了很多疏解、綜合的工作，而且也爲後代的學僧樹立了佛教義學著述的典型。

八、佛教對於當時社會的貢獻和影響

隋代佛教在當時政治上的作用有安撫人心、安置北周後宮嬪妃、以及被帝王利用爲政治符瑞等項。也有少數野心家，利用佛教中的彌勒信仰而稱亂。另有某些僧衆曾幫助隋末李世民的革命運動。在國家經濟方面，佛教的發展對隋政權的經濟力量固然未曾構成大威脅，然而在隋煬帝時，曾下詔裁併寺院，沙汰寺僧，這是不是隱示煬帝其人對佛教發展所可能產生的某一種影響，開始有所警覺。

在社會方面，隋代佛教對當時民衆有極普遍而深遠的影響。不祗充實了當時大部分民衆的精神生活，而且也從事相當多的社會慈善事業。例如對民衆之財物布施，急難救濟，平民疾病的醫療，修築橋梁，救濟獄囚等等，都對當時百姓有相當大的貢獻。至於不良影響方面，由於隋代佛教的急速增加，其中之雜有部分莠劣份子是所難免的。這些僞濫僧徒對於社會當然也會有若干惡劣的影響。僧徒的僞濫所造成的不良後果，也是後來唐高祖所以要淘汰佛教的一項原因。

隋代佛教在文化上的成就，單祗佛教義學與思想方面，即足以在中國佛教史上永垂不朽。信行的三階思想、智顗的天台義學、吉藏的經論章疏等，都是中國佛教史上極高的成就。

九、佛教精神和藝術的表現

隋代的佛典翻譯事業雖不佔重要地位，而在佛教藝術方面，則成績頗佳。文、煬兩帝及智顗的造像數量最多。計有金、銅、檀香、夾紵、牙、石等立體像，及刺繡像、畫像等平面像諸類。寺塔的建築，以文帝的成績最好。他三次下詔頒建舍利塔，使佛塔遍佈於天下百餘州。這種成就是歷代帝王中所罕見的。此外，佛寺壁畫、石窟、石經等事，也都是隋代佛教在文化上的高度成就。

隋代某些佛教所顯現的宗教精神，也頗不尋常。如普濟、大志的殉教精神，智舜的大悲利他精神，信行、志寬等人的入世濟世精神，以及智顗、靖嵩之不媚權貴的精神等，都是維繫佛徒信仰的主要命脈。也是足資後代佛徒景仰取法的宗教楷模。

隋代佛教已脫離前此依附印度佛教的形態，而成爲日本等國佛教所依附、汲取的對象。當時入隋的印度僧人，對中國佛教都沒有太大的影響，而後三韓、日本等國僧人則紛紛到中國學習佛法，尤其日本遣隋使的來華，對該國佛教的助益尤大。

十、結語

綜上所述，可見在中國佛教的發展史上，隋代實在是我國佛教的黃金時代。這三十餘年間，帝王、貴族、官吏等上層社會都普遍地崇佛。沒有廢佛運動及具代表性的排佛言論。在釋道二教的關係上，佛教勢力又遠大於道教。加上宗派的形成（三階教）及宗派基礎的建立（天台），日本、朝鮮等國僧人的入隋求法等等現象的集合，顯示出隋代佛教的地位，確是大異於前朝。也使中國佛教在隋代才正式高舉起獨立自主的大纛。因此，單說隋代佛教是南北朝到唐代之佛教發展史的過渡時期，這是不甚恰當的。正確地說，隋代是中國佛教史上最主要的分水嶺。前此的魏晉南北朝佛教，祇是印度佛教的附庸，而此後則形成了中國佛教的正式獨立。唐代中國佛教的隆盛，正是隋代佛教繁花所結成的碩果。也可以說唐代佛教發展的基礎，在隋代三十幾年間也已經堅固地奠定了。

註：①「廣弘明集」卷十周高祖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請開法事條。

②「舊唐書」卷七十九傅奕傳。